

博物馆进入“沉浸时代”，感官残障观众如何“入场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怡蒙

如今,许多博物馆将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等多种感知方式融合,创造出多层次、立体的参观体验,让观众能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展览及其背后的文化。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一个保存文物、举办展览的场所,而是逐渐集学习、社交和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客厅。

当越来越多博物馆在走向“沉浸式”和“互动性”,感官残障人士在参观时,如何最大幅度获取展品信息,获得更深入、更有情绪价值的体验?在第34个“国际残疾人日”即将到来之际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走访多方,试图寻求解答。

残障人士的需求从“能进入”向“能深度体验”升级

湖南男孩林林今年9岁,4岁时就医诊断出视神经萎缩,如今只能感到光暗。过去几年,林林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多地问诊手术,也带他去当地的名胜古迹、博物馆。林林总是很期待,想要亲身抵达并“看看”北京故宫、苏州园林。

妈妈唐君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许多场馆有盲文导览图和盲文导览册,她和孩子也会租耳机听讲解,但缺乏视障人群专门的讲解版本。“希望能有视障人群专有版本,能对展品外形有更详细的描述,比如长宽高、颜色与材质等。现在很多自助讲解耳机只是将展板有的文字复现了一遍,没有太多信息增量。”

林林喜欢触摸,在有的博物馆,他只能摸墙面突出的大字和装饰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博物院“博爱馆”,有许多附带盲文介绍的文物复制模型,墙上的文字介绍有添加了盲文的亚克力;馆内还有互动游戏装置,将触觉、嗅觉、听觉等各种信息结合,让某一感官有残障的游客也可以感受到信息。

“残障人士的需求正从‘能进入’向‘能深度体验’升级。除了基础通行,他们还希望获取与普通观众同等丰富的展品信息,有着个性化、多元化的服务需求。比如,视障人群需要分层次的触觉体验与口语描述服务,听障人群期待更精准的手语翻译与实时字幕同步。”“奇途无障碍”创始人纪寻说。

“奇途无障碍”是一家通过自媒体、数据库和社群搭建等方式,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出行、就业、教育培训、社交等方面的信息内容服务和社群发展服务的组织。纪寻是一名“腓骨肌萎缩症”罕见病患者,从2020年开始,她在知乎上通过“奇途无障碍”账号分享残障相关知识,吸引和聚集了更多残障人士。她和团队发起的“无障碍博物馆残障社区连接计划”,持续在做“无障碍博物馆测评指南”。

19岁的杨天心先天感音神经性耳聋,戴助听器可以放大声音,但她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听不清不是因为声音小,而是“分辨率”不够,模糊的声音会配合观察说话人的口型,来判断对方说了什么。

她还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,如今双眼裸眼视力0.05,矫正视力0.3。平时她会使用一些辅助的软件,通过镜头扫描场景识别物体或文字。她也了解到,会有视障人士在博物馆用AI工具来了解展品。

“盲人去博物馆的意义是什么?和在家听相关内容有什么区别?当我知道我真实地存在于那个空间,与几百年,甚至几千年前的东西距离只



①视障文化博物馆“触摸文明”展厅。
②2024年12月3日,中国盲文图书馆·视障文化博物馆与甘肃省图书馆共同举办的“流动的博物馆”活动现场。活动方供图
③2025年5月18日,中国盲文图书馆·视障文化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“流动的博物馆”活动现场。活动方供图

有几米,我会觉得机会难得,还会想,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我能感到自己同样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真实,以及和世界的链接。”杨天心说。

作为一个视力、听力都很弱的人,她常感到生活有些虚无缥缈,很难与身边的人建立长期友情,活动范围也有限。“我想要不局促地、不妨碍他人地自己感受这一切。”杨天心说。

第一步:知晓、进入、触碰信息

如果将感官残障人士的博物馆体验拆解成“基础”和“进阶”两部分,林林和杨天心已经属于对博物馆参观较为有经验的“进阶”人群,还有很多人对博物馆无障碍设施不够了解和信任,也极少踏入博物馆。

近年来,国内部分机构正在着手改善“基础”的工作。开办于2024年的视障文化博物馆位于北京中国盲文图书馆内,是中国首家以视障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,现有视障文化展厅、爱眼护眼展厅和触摸文明展厅。

前两个展厅展示盲人历史与文化发展,提供防盲治盲科普知识;触摸文明展厅则是专为视障人群设计的核心展厅,系统开发了涵盖中外文明的代表性文物复刻模型、建筑微缩模型等触觉展品,所有展品均开放触摸。

馆内设置有明盲对照说明牌,还有高精度室内语音导览系统,观众行至展品前,语音讲解即自动触发。自开馆以来,博物馆已累计接待各界观众4万余人次。视障观众来馆,也有许多其他观众到访,在特别设置的黑暗通道中感受视障的世界。

视障文化博物馆的“流动的博物馆”系列活动已走进多个省份。在浙江,它们带去了三进四合院模型、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仿制品,以及浙博十大“镇馆之宝”仿制品,还有十二生肖木板拓印、甲骨文书签制作、浙博善财童子像雕版印刷等体验项目;在河北,带去北京2022冬残奥会火炬、十二生肖首兽之龙首和蛇首、野战陆军头盔、C919飞机模型等5件可触摸展品,及拓印、盖章等体验活动。

中国盲文图书馆视障文化博物馆馆员张凯奕介绍,这一系列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4万人次,“目前,我们正在西安举行一场新活动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
记者 郭韶明

2024年5月的一个晚上,90后青年李博第一次走进程丹妮的“客厅”,觉得自己“像是回到了家里”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“客厅”里那个“有魔力的沙发”,因为“一坐上去就很想睡觉”,这是一种“安全感”的体现。作为一名深漂创业者,那一刻,他在异乡感受到了“家”的具象化。

从互联网行业裸辞后,程丹妮决定针对上班族打造一个专属“社交客厅”。“我对这一群体的痛点、画像比较清晰,也了解他们的社交需求。”程丹妮告诉记者。由于喜欢乐队“草东没有派对”,某天她灵光一现,一个名为“社畜没有派对”的“社交客厅”就此诞生。

从北京、上海、深圳,再到沈阳、成都等城市,各式家庭俱乐部(homeclub)、家庭酒吧(homebar)层出不穷,核心是打造以“客厅”空间为中心的青年社交。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,“社交客厅”是他们在城市中的一个“锚点”,他们把一部分“自我”安放在那里,让灵魂“有处可栖”。

青年社交中的“缺位”与“错位”

从“一周CP”(CP, couple的缩写,指情侣——编者注)“盲盒饭局”再到“社交客厅”……近年来,各类社交模式引领青年社交新潮流,“客厅”,作为一个社交空间载体,将分布在城市各处的青年聚集在一起,他们可以在“英语角”畅所欲言,在“解忧杂货铺”吐露心声,也可以纯粹享受一次“狂欢派对”。

“社交客厅”主人往往也是年轻人,创建“客厅”的初衷是观察到了青年社交中人际关系的“缺位”。今年3月,刚刚完成环中国旅行的塔拉决定“入局”社交领域。“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背包客,在青旅遇见了很多朋友。在那里,我可以随时随地跟人打开话匣子,惊叹于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有人以各种我没见过的方式生活着。”回到北京后,他感觉“没有途径认识新的人”,又觉得“这样的空间不应该只存在于旅游



在程丹妮的“客厅”里,大家一起为过生日的朋友准备惊喜。



“A-HA客厅”一周年活动:向大家征集“A-HA moment”并做成了桌面小展。受访者供图

“社交客厅”成为年轻人的另一个家?

中”,基于这样的理念,他创立了“Tt社交俱乐部”。

在“社交客厅”里,年轻人可以结识生活圈子以外的朋友,拓展人际关系。“我们的用户覆盖了18到35岁的年龄段。”“A-HA客厅”的主人王诗雨说。“A-HA”源自一个挪威乐队名,“啊哈体验”或“顿悟时刻”(A-HA moment)常用来形容问题解决方案突然明朗的瞬间。王诗雨希望,每个来到客厅的客人都能收获自己的“啊哈体验”。

因为“客厅”离天津大学、南开大学很近,所以会有很多大学生来。除了老师,大学生在校园里其实很难接触到其他年龄段的人。他们来到这里,遇见不同的人,在情感、学业或求职方面都能收获一些不同的见解。”她表示。

相较于人际关系的“缺位”,青年社交中更多面临的是与身边人生活节奏的“错位”,而“客厅”刚好能够弥补这一“缺口”。塔拉说,“比如今天晚上我临时想出去玩,给朋友打电话,他说明天要开组会今晚得忙,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要陪家人,大家时间凑不到一起。”

“有一部分已经进入职场的人,可能他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。”王诗雨表示,“相比于一线城市,在天津大家进入到婚姻、育儿阶段会偏早一些。当朋友与自己的人生‘错位’时,他们可能需要寻求一些别的社交。”

在城市里搭建一个临时的“家”

来到程丹妮“客厅”的客人需要穿过两道门,一道是院子的铁门,一道是通往客厅的“家门”。“外面的铁门一般是不关的。”李博告诉记者,“每次去可以直接走进她家房子,有一种家人给你‘留门’的感觉。”

如何让年轻人来“社交客厅”感到“宾

至如归”?首先是需要消除“距离感”。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,人与人之间有时像是有“无形的壁垒”,社交网络让人们看似“紧密相连”,却又“遥不可及”。“我们的‘客厅’一般从晚上7点营业到12点,这5个小时我基本不看手机,很多参与者也是,一个晚上基本不看手机、不回复任何消息,这其实很不可思议。”王诗雨告诉记者。

程丹妮则认为,如果没有线下社交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“萎缩”。“在网络世界里,语言面临‘通货膨胀’,大家张口闭口‘宝宝’,一到线下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。面对这种困境,我觉得更有必要打造一个空间,让大家真实地走到一个环境里,跟每一个真实的人对话,表达一些真实的感受,建立深度联结。”

要在“客厅”里建立真正的深度联结,除了要打破“手机屏幕的区隔”,还需要突破“心灵的区隔”。在程丹妮的“客厅”中,深度交流是自然而然发生

的过程中,他表示“自己思考的维度得到了拓展”。

程丹妮也曾面临“长达一年的瓶颈期”,但她最终选择做一个“长期主义者”。“这个赛道投资回报率其实很低。”程丹妮告诉记者,“但‘客厅’是我完成自我成长与升级的载体,我希望以一种品牌的思维去经营,也愿意给自己时间。”

对于主人而言,“客厅”不仅是一份事业,更是一次与客人的“合作”。客人将自己交付给“主人”,主人也将自己交付给这些萍水相逢的“家人”,他们共同“撑起了”这个临时的“家”。

在社交客厅中“看见”彼此

塔拉的“客厅”里挂着一张背景布,上面写着:“就做你自己吧,奇怪一点也没关系”。在社交中,年轻人始终在寻求一个“做自己”的时刻,那也是他们“被看见”的时刻。

“‘客厅’是一个如果你想被倾听,你可以‘被看到’的空间。”廖欣雨表示,“在这里,大家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,试图理解你的困境,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一些见解。”

在许多社交场合,内向者的需求常常被忽视。“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客人70%以上都是内向者。”塔拉说,“实际上他们只是刚开始融入会相对慢一些。我后来发现运营‘客厅’的关键点在于把内向的人串联起来,而不是要举办多厉害的活动,而是要让他们感到被‘接纳’。”塔拉说。

“接纳”让年轻人获得归属感,而“对话”让他们“更深入地被看见”。“A-HA客厅”里,一场“非正式面试”正在进行。这里不需要成功的经验,每个人都可能带上“翻车现场”“糟糕恋爱”“面试事故”,勇敢讲述自己的失败经历。

“现在大家的简历会把自己‘包装’

□ 林铁南

古往今来,以“家”为线索的作品数不胜数。思而不得的乡愁,叶落归根的奢望,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弦。不过,美国人到中国来寻找祖辈的“家”,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。纪录片《鼓岭家书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真实故事。

影片中美国姑娘霍莉·柏的先祖,是近代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兰马利亚。她在福建生活了近40年,创办的闽清六都医院治疗了超过30万名病人。一生中,她只回美国休假5次,除了进修医术,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医院演讲和募捐。她在最后一次休假期间突发疾病去世,再也没有回到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。

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?为什么兰马利亚会视之为家,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?这些问题都是霍莉·柏旅程的起点。

与霍莉·柏同行的周天懿是我的研究生。影片拍摄期间,她正在协助我进行“鼓岭家族故事展示馆”的布展工作,其中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追溯兰马利亚和兰醒球母女的故事。对于在上海长大的天懿而言,兰马利亚笔下的福建还是一片陌生地名的集合,她也需要一次属于自己的探索之旅,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历史的温度。

霍莉·柏与天懿的旅程从闽江口的川石岛开始,沿着兰马利亚母女的足迹,慢慢延展到福州和鼓岭,再上溯至梅溪畔的闽清。在道科厝和恩兰楼前,她们拼凑出兰马利亚当年“家”的底色:危险的闽江水道、简陋的医疗条件、摇摇欲坠的土木屋宅。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医是莫大的挑战,但兰马利亚并不孤单:在她身边,有留学归来、服务祖国的同事许金钊,有始终深爱和支持她的女儿兰醒球,还有那些用鸡蛋、刺绣和朴素的话语表达感谢的中国百姓。兰马利亚的传奇并不是孤勇者的东方冒险,而是一段她与中国人共同书写的“相互成就”。

兰马利亚临终时,陪伴在身边的是她的中国养女兰醒球,她后来成为福州毓英女中的校长,在抗战中带领学生们从福州迁往内地的闽清。那是那段艰险的旅程,在霍莉家流传下来的故事里,兰醒球在迁徙中伤重不治,家族从此失去了这位“中国姑奶奶”的消息。但天懿告诉霍莉,那只是误传:兰醒球不仅从重病中康复,还以62岁的高龄再度赴美,入读兰马利亚的母校雪城大学。博士毕业后,她定居于波士顿,那里其实离霍莉家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州仅有一小时的车程。

在天懿完成的前期研究里,兰醒球是一位受过完整现代教育、说着流利英语的“新女性”,她的举止似乎已全然西化。霍莉用一本在自家衣柜夹缝里发现的小书告诉天懿,事实并非如此。这本由兰醒球亲手制作的《中国年节》,用美国人看得懂的方式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,兰醒球还细心地为每个节日绘制了插图。霍莉将它捐给了鼓岭的展示馆,让每一位来客都能在泛黄的纸页间看到百年之前的“文明互鉴”。

对于这段旅程,也许没有比霍莉和天懿更好的组合了。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,但她们一样年轻、一样纯粹、一样友善;她们都能熟练地用对方的语言沟通,抖出包袱,也接得住梗;她们都不被成见束缚,愿意靠近、倾听、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所得与所知。她们在补全自己的同时也,也成就了对方。

如果说《鼓岭家书》有什么遗憾,那大概就是时间太短、故事太多,短短50分钟,远远装不下画面之外那些奇妙的缘分。今年7月,我们接待了海门微医生的后代托马斯,海门微医生,就是当年接替年老的兰马利亚、执掌六都医院的第二任院长。当她从福州启程前往闽清时,陪伴同行的是一位比她大几岁的中国姑娘,安静、目光柔和、好意都写在脸上。她们后来成了终生的好友。

这位中国姑娘的名字,叫兰醒球。

(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,“鼓岭家·谱”计划发起人)



得很优秀,但失败的经验也有价值,所以我们想着能不能逆向而行。很多人在分享了自己觉得失败的经历后,反而会收到其他人的正向反馈。其实你认为的失败,在别人眼里可能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。”王诗雨说。

“深度对谈(deep talk)大会”是程丹妮“客厅”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,她认为,深度对谈(deep talk)的核心是“找到自己”。如何在与陌生人的“对话”中“找到自己”?廖欣雨认为,陌生人社交的“次抛”性质可以帮助自己卸下自我表达的心理负担。“有时因为和朋友太过于了解彼此,我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负担,在陌生人社交中,我抱着大家只会见一次的心态,不会顾虑太多,反而更能表达自我。”廖欣雨说。

陌生人有时候也有朋友具备不了的功能和魔力。“有时候一些负面情绪如果我输出给一个人会很沉重,但是如果输出给在场10个人,每个人都帮我承担一点,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”程丹妮说。

在“自我能见度”提高的同时,好的社交场域也能带动人的成长。“我一直都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,积极向上的磁场会滋养人的状态。”李博说,“之前还有朋友通过‘客厅’简历内推,最后拿到offer的好事发生。”

“以前遇到问题我喜欢自己解决,但现在我想多听一下外界的声音,因为大家的世界是一定比自己的世界要大的,可能会提供给我一些不可思议的答案,所以我会主动去参加这些活动。迈出这一步后,我发现我自己到了一个新世界。”廖欣雨告诉记者。

在自我成长之余,更重要的是在社交中和他人一起成长。李博认为,程丹妮能够“带动他人成长”。“我觉得我很好,所以吸引的朋友也很好,整个世界都变得很明亮。我希望每个人给予他人的善意是溢出来的那部分,而不是掏空自己拿出来的部分。”程丹妮说。

在与好友对谈的播客里,程丹妮认为是“创造快乐的人”。而塔拉更愿意成为一个“传递快乐的人”。他们希望,在“客厅”里,快乐无限生长,每个个体也能彼此“看见”、彼此“照亮”。